



沉浮录

中南海风云人物



顾保孜 著
杜修贤等 摄影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南海风云人物沉浮录 / 顾保孜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21-09603-6

I. ①中… II. ①顾… III. ①政治家—生平事迹—
中国—现代 IV. ①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8816 号

中南海政坛人物沉浮录

顾保孜 著 杜修贤等 摄影

出版统筹 曹维琼

责任编辑 陈 荣 朱智毅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24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引言

“文化大革命”十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忘却的十年，留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思考。

在这场动乱中，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和损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兴风作浪，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许多党和国家的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遭受冲击，被迫害致死；大批的优秀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人士横遭凌辱，饱受折磨，家破人亡……

这十年中，生者忧心忡忡，死者含恨于九泉。

但是，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的意志不可抗拒。“文化大革命”在亿万人民的愤怒声中，被制止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了，被颠倒的历史又正了过来。冤死者得到昭雪，受诬陷者终于平反。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风云人物，虽然在动乱中一时得逞，飞黄腾达，不可一世，但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终于受到人民的审判，浮上高层又沉入地狱，成为历史的罪人。

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十年动乱中也有一部分工人、农民、老干部、学者、知名人士……或者由于自身原因，或者因为时势所驱使，也浮上高位，声名显赫，但随着动乱的结束，他们又回到原来位置。起浮沉落，好像历史对人们开了一个玩笑，而这笑，只能是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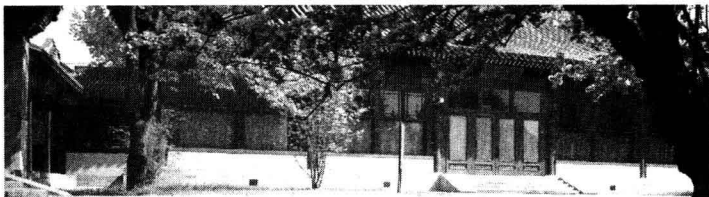
沉浮录
中南海风云人物

笑，是无可奈何的苦笑。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有如一面镜子，清澈明晰，纤微毕现。这十年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不能忘记的。为了今天和明天，让我们在回顾这些不可忘却的往事中沉思吧！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李立三在悲剧中闪光/1

在当年的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三个字就会警觉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被沾上“机会主义”的病毒。但叶莉扎维塔却认为，不管他是叫李明，还是叫李立三，都不能阻止她对他的友谊。

第二章 “乐天派”廖承志/16

他在附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第一幅画是爸爸在长征时的大致景象，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的胜利。你爸爸要说诉苦忆甜，自问五谷不分，惭汗无地。但吃苦也在长征时尝过……”

第三章 伍修权的“三八”传奇/27

伍修权是一个不幸而又有些幸运的人。不幸的是，他没能躲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棍棒，在政治的大劫难中无力摆脱厄运，遭受到了无情而漫长的打击；而他到底没有在漩涡中彻底地沉下去……

第四章 陈再道盼来平反的曙光/41

会议刚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发言，称“七二〇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暴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

第五章 “铁骨”立地罗瑞卿/56

罗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轻时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曾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他跟随毛泽东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师生都亲切地称他“罗长子”。



第六章 乔冠华的坎坷政治生涯/67

在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时期，外交史上，有三个人形象在杜修贤的摄影镜头里特别富有个性。一个是周恩来，具有儒雅风度的外交家；一个是陈毅，具有大将风度的外交家；再一个就是乔冠华，具有才子风度的外交家。

第七章 杨勇保卫北京军区/80

失去自由的杨勇也曾苦苦反思着自己的过去，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找到被审查的原因。反思的结果，却是使他从怀疑自己变成了坚信自己，由不安变成了坦然。

第八章 第一个蒙难的张霖之部长/92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上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

第九章 海军参谋长张学思遭诱捕/101

在相当长的日子里，张学思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折磨。虽然参加革命几十年，但由于他特殊的身份和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他很少参加党内的政治运动，很少有党内斗争的经历和经验。

第十章 被“漩涡”吞没的周小舟/120

毛泽东对周小舟颇为信任，他先派周小舟去新疆盛世才处做工作，以扩大统一战线并开拓与苏联的联系通道。他去了以后，做了不少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

第十一章 历史跟杨荣国开了个玩笑/131

杨荣国死了。但他终究不明白，研究政治的学术不是政治，就像宗教学不是宗教而是科学一样。他明白学术的价值在于真，到头来却用政治需要去衡量。



第十二章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142

编辑毛泽东著作，宣传和普及毛泽东思想，是田家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从到毛泽东身边开始，他就一直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曾这样说过：“毛泽东思想已渗入到我的骨髓里。”

第十三章 陆定一因何被称为“阎王”/153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陆定一以一支犀利的笔，撰写了大量的文章，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呐喊助威。然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努力能见效吗？

第十四章 邓拓栽倒在“三家村”/167

邓拓强抑住心头的隐隐疼痛，委婉地用曲笔进行一些揭露和反击。他不点名地提到了那个几十年一贯以整人为业的康生，康生看到这封信后，一直愤愤于怀，曾经恨恨地骂了一句：“邓拓临死前还咬了我一口！”

第十五章 廖沫沙控诉“四人帮”/181

当身心遭到摧残的时候，有人万念俱焚、一蹶不振；而有的人则信念弥坚，不屈不挠。廖沫沙就属于后一种人。在监所中，廖沫沙仍然坚持学习，用书籍来充实自己。读书的同时，他又慢慢开始学习做诗、改诗。

第十六章 匆匆“谢幕”的王力、关峰、戚本禹/194

1965年对于王力来讲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便是王力。文章受到了重视，王力从此开始平步青云，跻身上层。

第十七章 “风流倜傥”的总长黄永胜/223

在开国一代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中，黄永胜称得上是一员名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黄永胜很可能把他那份辉煌的履历保持到生命的终点。然而，历史是不存在“如果”的，历史无情。



第十八章 吴法宪——从王牌政委到阶下囚/232

公正而言，吴法宪是有过功劳的，但并非功勋卓著，他也是有才能的，但并非出类拔萃。在开国之初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他是一个二流人物，但绝非草包。

第十九章 李作鹏的沉浮人生/244

如果说吴法宪在黄、吴、李、邱四人中是认罪态度最好的，那么李作鹏则是四人中态度最坏的。他起初拒不交代任何罪行，也不承认自己有罪，认为自己是“城楼失火，殃及池鱼”。他仍把自己罩在过去功劳的光环里，并且以功臣自居。

第二十章 林家“后勤部长”邱会作/253

邱会作作为人机敏，善于随机应变，属于眼灵脑快的那一类人，多年从事军队的财经工作，更使他练就了精于盘算的本领。但是，当这些品质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的时候，最终却把邱会作推上了林彪的贼船。

第二十一章 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2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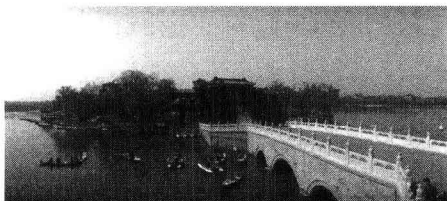
林立果在“讲用报告”中，把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吹嘘得法力无边、神乎其神，说毛泽东思想是万能的，连精神病患者和疯子，只要一念毛主席语录，病人就会热泪盈眶、霍然痊愈。

第二十二章 炙手可热的风云人物毛远新/278

江青对毛远新甚至比对她的亲生女儿李讷还要好。李讷有什么要求，自己又不敢贸然向江青开口，就开口叫毛远新出面与江青谈，这一招往往有效，因为江青对毛远新向来是有求必应的。

第二十三章 “以工代干”的副委员长姚连蔚/290

提起24年前的那段辉煌时刻，姚连蔚感慨地说：“我能一步登天，自己做梦也没想到。那时选党的代表、人民代表，上面把阶级出身、民族、宗教信仰等这些都确定了，要下面按图索骥……只有我是正儿八经的陕西西安籍工人——这正是大会主席团要物色的人选。”



第二十四章 马天水迷途入深渊/296

30年代初期参加革命，有过一段革命历史的马天水，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步入晚年，竟然堕入了深渊，走上一条罪恶的道路，不但坑害了众多的上海干部和群众，而且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以至古稀之年只能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来度过其余生。

第二十五章 “四人帮”在1976年/307

杜修贤的镜头里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哪个镜头里有江青的身影哪个镜头里的人物表情就异常严肃，双足立正，两臂僵直，肌肉紧绷，活像木偶荟萃。如果镜头里没有江青，人物表情活泼自如，嬉笑轻松，其乐融融。

第二十六章 王、张、江、姚落网实录/323

79岁高龄的叶剑英元帅，亲自来到怀仁堂正厅，指挥这一场决战。决战的指挥所与战场，同在一间大厅。战役最高指挥员与第一线战斗员，同在一个阵地，相距仅数步之遥。这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战法，表现出最高指挥员恢宏的气魄和胆略。

第二十七章 “四人帮”在上海滩的“小兄妹”/335

很有些文才的徐景贤，写起杂文、政论、影评来，头头是道，笔锋甚是厉害。这支笔杆子的频频外露，终于被张春桥发现，进入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是徐景贤发迹的关键一步棋……

第一章

李立三在悲剧中闪光

在当年的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三个字就会警觉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被沾上“机会主义”的病毒。但叶莉扎维塔却认为，不管他是叫李明，还是叫李立三，都不能阻止她对他的友谊。她喜欢他的爽朗、耿直，常听中国同志戏称他为“坦克”、“大炮”，那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她爱他有理想、有追求，有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她欣赏他那极富传奇的浪漫色彩的革命生涯……

他分别在苏联和国内坐过牢，两场举世震惊的政治大灾难，他均是受害者

鲁迅有句名言：“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本世纪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里先后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政治大灾难。这两次灾难，给本篇的主人公——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带来了一生的悲剧。

本世纪30年代，在苏联，由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洛夫遇刺身亡而引发的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或称“大清洗”，造成了全苏联的政治恐怖局面。据统计，有70%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56%的党代会代表被逮捕和枪决；苏联红军3.5万人遭难，全军近半数的军官被送进集中营；1933年联共（布）有党员350万人，1937年只剩下200万人以下。

这场政治灾难发生30年过后，中国大地上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政治大灾难。即从1966年到1967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长达十年的全国性动乱。它摧残了大批干部，包括受牵连的在内，约有上亿人，占全国人数的1/9，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 000亿人民币。

两场灾难，李立三皆为受害者，也是见证人。他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对那些疯狂的、丧失人性的邪恶政治势力的声讨和控诉，表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为捍卫真理和正义，宁折不弯的高尚情操。

1930年底，年仅30岁的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只身来到莫斯科检查交代错误。此时的他已被免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一切职务，因为他在中央工作期间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策略上脱离了共产国际的指导，受到共产国际的严肃批判，并且将“立三错误”定性为“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

谁知一去就是15年，这期间，他在莫斯科遇到了红颜知己——苏联姑娘李莎，缔结了跨国姻缘，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佳话。

1933年夏季的一天，19岁的苏联姑娘叶莉扎维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即李莎）去看望朋友莎丽达·列依索洛娃，列依索洛娃的丈夫叫杨松，是中国人，在共产国际工作。

当叶莉扎维塔推开杨松家的门时，一眼便看见沙发上坐着一位身材高大、笑容可掬的中国青年。杨松指着这位中国青年对她说：“认识一下吧，这是我

的中国同胞李明同志。”

李明当即站起，不失礼貌地同叶莉扎维塔握手，就这样，他们相识了，并开始了交往。

过了些日子，还是在杨松的家里，许多朋友来这里聚会，叶莉扎维塔也来了，她很乐意同中国同志聊天，同时可以更多地与李明会面。通过前几次的接触，她对李明的印象颇佳。今天，她渴望在杨松的家里再度与李明会面，可是，李明还没有来。

有人大声问杨松：“老杨，李立三今天能来吗？”

叶莉扎维塔一惊，也大声地问：“怎么，李立三在苏联？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列依索洛娃咯咯笑起来，戳点着叶莉扎维塔的额头说：“你呀，真是个小傻瓜！李立三不就是李明吗！你同他那么好，还会不知道？”

叶莉扎维塔被这意想不到的事情搞糊涂了，一时愣怔无语。她确实还不知道李明就是李立三，因为李立三没有对她讲过这事。

在当年的莫斯科，很多人一听到李立三这三个字就会警觉起来，离他远远的，唯恐被沾上“机会主义”的病毒。但叶莉扎维塔却认为，不管他是叫李明，还是叫李立三，都不能阻止她对他的友谊。她喜欢他的爽朗、耿直，常听中国同志戏称他为“坦克”、“大炮”，那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她爱他有理想、有追求，有脚踏实地的革命精神；她欣赏他那极富传奇的浪漫色彩的革命生涯……时间荏苒，随着接触增多，两颗心逐渐向一起靠拢，爱情的种子在他俩的心中慢慢地生根，发芽，含苞欲放。

当时，叶莉扎维塔正准备考大学。她狂热地爱上了比自己大15岁的李立三。此时李立三远离祖国，孤苦寂寞之中得到美丽的叶莉扎维塔的爱恋，自然十分高兴，他同样深深地爱着叶莉扎维塔。

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柳克斯公寓7层楼上的一间14平方米房间里，李立三和叶莉扎维塔举行了简单的婚礼，陈云等十几名中国同志参加了婚礼，向新郎新娘表示了良好的祝愿。

按照苏联的传统习惯，女人出嫁后必须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丈夫的姓氏，这样一来，叶莉扎维塔应该称为叶莉扎维塔·李，李立三根据莉扎的谐音，给妻子取了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

从此，李莎便将自己的命运同李立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新婚燕尔的李立三被苏联内务部的人带走。 李莎吃尽辛苦千里寻夫

新婚燕尔，李立三和李莎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他们没有休婚假，而是以勤奋的工作来欢度蜜月。

1938年2月23日，天还没有亮，一队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官兵及内务部的人员急速地踏进了高尔基大街上的柳克斯公寓。粗暴杂乱的皮靴撞击地板的响声把李立三和李莎从睡梦中惊醒，一种不祥之兆袭上他们的心头。

有人在敲李立三的家门，固执而粗野。李立三会意地看了看李莎，走过去打开房门。

闯进来几名带枪的军人，为首的军官严肃地问：“你就是李明吗？”

“是的，我是李明。”李立三用俄语回答，语气是平静的。

军官斜睨着李立三，冷峻地说：“你被捕了！穿好衣服，立即跟我们走！”他向李立三出示了逮捕证。

几名士兵一拥而上，推起李立三就走。

李莎冲过来阻拦，护住李立三说：“你们凭什么抓人？他是个好人，他没有罪。”

军官冷笑着说：“有罪没罪，请到肃反委员会去解释。”他一把拽开李莎，大喝一声：“带走！”

李立三临出门时，回过头说：“李莎，不要哭，快去告诉我们的党组织，我是清白的，在莫斯科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苏维埃的事情。”

李立三被捕的第二天，有关人员就来撵李莎，让她立刻搬出柳克斯公寓。李莎第一次尝到政治上被歧视的滋味，只好忍气吞声，按照有关人员的指令搬到公寓院子一隅的窄小厢房里，那是专门为被捕人员的家属准备的，已经住进了七八个人，把个小屋子挤得满满登登。

李莎虽然离开了共产国际的干部宿舍，可是，对她的政治迫害并没有结束。她所在的外语师范学院的团组织逼她在团籍和丈夫之间做出选择，要么要团籍，要么要丈夫，二者必取其一。

一天，学院团委召开全体团员大会，让李莎当众表态。面对全体团员期待而冷漠的目光，她的心在颤抖，这是艰难的选择，因为她既爱团籍，也爱丈

夫。经过思考，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平静地对大家说：“我的丈夫李明不是反革命，我了解他，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说完，她默默地掏出团证，轻轻地放在主席台的桌子上，转身走了出去。不知不觉中，眼泪流过面颊。

李立三被捕后同李莎失去了联系，既没通电话也没有书信捎来。李莎到内务部去问过几次，对方不是推说不知，就是缄口不语。因此，她一直不知道丈夫关在哪里。

李莎惦念着丈夫，决心找到他的下落。莫斯科的初春，乍暖还寒，她冒着凛冽的寒风几乎寻遍了莫斯科的所有监狱，得到的都是冰冷的答复：“没有。”

“总不会在地球上消失吧，肯定是关在了监狱里。”李莎不灰心，继续寻找。当冰雪开始消融、大地开始泛青的时候，希望的嫩芽也在李莎的心中萌发。这一天，她风尘仆仆地来到塔岗卡监狱，问讯处前仍然排起了长队，她随着人流一点一点地向前蠕动，终于来到了窗口前。她在递上身份证后大声说：“我找一个叫李明的中国人，原名叫李立三，他是我的丈夫。”

里边静悄悄的，没有传出以往听惯了的粗暴吼声。李莎感到奇怪，踮起脚尖向窗口里望去，只见一个上了年纪的看守正低头在一个大本子上查找。

又过了一会儿，窗口里传出老看守的声音：“有这个人。”

李莎心里一阵激动，终于找到了！她问老看守：“我可以见他吗？”

“不行！肃反委员会有规定，一律不见。”

李莎怅然若失地离开窗口，轻轻擦去不知不觉中涌出的泪花，虽然不让见面，但毕竟找到丈夫的下落，这对她来说就是很大的安慰。

时间似流水，李莎在痛苦的煎熬中度过一年半……

1939年11月4日的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李莎刚刚上床躺下，就听见有人敲门。“这么晚了，谁会来呢？”李莎疑惑地下了床，走过去打开门。

一名军官微笑着站在门外，态度和蔼地问：“您就是李莎同志吗？”

李莎觉得问话有些特别，因为自打李立三被捕后，很少有人对她露出笑脸，更没有人亲热地称她同志。

“是的。”李莎木然地点点头。

军官仍然是笑容可掬地说：“我给您送来了‘十月革命’节的礼物！”

军官闪开身，他的身后站着李立三。

李莎惊喜万分，旁若无人地拥抱李立三，疯狂地吻他。

李立三也紧紧地拥抱着妻子，感觉到她的全身在颤抖，他自己也是无比激动，无声的泪落在妻子的秀发上。

李立三终于无罪释放，回到了祖国。李莎不顾亲人们反对，来中国安家

李立三出狱之后，共产国际终于在1940年3月对李立三作出了结论：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搞清楚了，对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1945年12月31日晚8点钟，苏共中央联络部长潘友新将李立三找去，一见面就十分热情地说：“祝贺你，立三同志，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

李立三也很激动，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他，尽管他不在国内，还是选他为中央委员。

是的，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李立三，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李立三，在选举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时，毛泽东向与会代表讲了话，肯定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也许他当时不知道，他参加七大的党代表登记表是老朋友陈云代他填写的，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党和同志对他的信任。

潘友新还告诉李立三，共产国际无条件准许他回国。

1946年1月16日，在苏联生活了15年的李立三踏上了归程。

当列车徐徐开动的时候，李莎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她冲着火车大声说：“等着我，我也去中国！”

李立三走后，李莎便也着手做去中国的准备。这时，亲友们又来劝说她不要去中国。有人对她说：“中国还没有解放，内战正在进行，你刚刚经历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何必又要到中国去受战乱之苦呢？”还有人她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解放区的生活很艰苦，你何必舍弃苏联的优裕生活而去中国遭罪呢？”

李莎去意已定，她说：“立三的事业在中国，我应该到他身边去，助他一臂之力，他需要我，需要家庭，我不能丢下他独自在苏联享福。我既然做了中国人的媳妇，就应该到中国去。”

经过中共中央同苏共中央的联系，李莎带着苏共中央联络部签发的证件，于1946年9月底动身前往中国的哈尔滨。李立三此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工作，办公地点就在哈尔滨市。

李立三对妻子和女儿的到来非常高兴，在美丽的松花江畔，他们安了家。

李莎被安排在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任教员，她以满腔的热情为丈夫的祖国

工作，毫不保留地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中国学生。

一晃15年过去了，到了1964年时，李莎已完全熟悉了中国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可是，中苏两党的关系却剑拔弩张，日趋恶化。因为有一个苏联籍的妻子，李立三的处境艰难起来。当时，苏联撤走了全部专家，许多生活在中国的苏联人也都回国了。李莎面临着选择，是继续留在中国，还是回苏联？

这时，康生出面劝李立三同李莎离婚，当然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可是，李立三没有这样做，他与李莎是患难之交，彼此心心相印，怎么可以离婚呢？

李莎也舍不得扔下李立三回苏联，她毅然放弃了苏联国籍，申请加入中国国籍，表达了她对李立三坚贞不渝的感情。1964年7月，李莎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文化大革命”呼啸而至，李立三又一次在劫难逃，为刘少奇辩护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1966年春夏之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在中国大地上呼啸而至，李立三戴着“立三路线”的帽子，自然属于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之列。但是人们都知道，李立三的错误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并且是反复清算和检查过的。他虽然是华北局书记，而实际上早已靠边站了。他既不是主要的当权派也就不可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造反派”。因此，华北局机关内普遍认为他是只“死老虎”，造反派们也没有兴趣多去理会他。这样，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的半年里，他只作为陪斗参加一些批斗会，人身尚属自由。

1966年底，他被通知参加批斗陶铸的大会。他听到的“揭发批判”是一派胡言乱语，看到的是陶铸被造反派的侮辱折磨搞得精神恍惚。他抑制不住心里的悲愤，离开了会场。这种毫无根据的无限上纲、乱定罪名的行径，简直与苏联1938年肃反高潮的形势毫无二致。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他准备上万人大会接受批斗，但无论如何都是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